



雁归行

文剑



雁 归 行

文 创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的作者文钊，是中国血统加拿大人，现任加拿大一所大学的教授。他出生在上海，青年时期是在台湾度过的，对于台湾社会有比较深切的了解。这部作品描述了台湾一对青年的恋爱悲剧，以及社会给他们造成的苦闷。小说还反映了海外华侨的生活和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。作品笔调清新，富有新鲜动人的情趣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之外的
地区，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，翻印必究。

版 归 行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印数 10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150,000

书号 10019·2960

定价 0.41 元

自序

十几年来，我一直想把自己看到的，想到的，有关祖国统一的问题，透过文学的方式，描写出住在台湾的大陆人的心情，也想描写一下台湾同胞对祖国的向往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一直到去年夏天，我才能安心地坐下来完成这部小说稿。

令我兴奋的是，六个月之后，中美建交了。我那时正在北京旅行参观，我和国内的几位文学界朋友，交换了意见，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鼓励，因此决定将这部小说稿予以修改。我自己对初稿也不满意。今天我完成了修改的工作，但对文字的修饰，以及内容的安排，还不能百分之百的满意。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文学写作修养及训练还不够，还要再磨练，再学习。

这十几年中，我看到一部分爱国人士，从台湾出来之后，经过外国，再回到祖国。同是中国人，分住在台湾和大陆，不能互通音讯，不能互相拜访。这种怪异现状，使我心里一直存在着个问题，那就是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统一，从而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。

书里的男主角石坚如，就是一个例子。他爱自己的祖国，也看清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受的威胁，决定回到祖

国，参加直接为祖国建设的工作，这种精神是可敬佩的。他也因为上一代留下的政治仇恨，使他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台湾女孩子林丽花结合。林丽花是个时代的牺牲品。她向往祖国，可是她却不能回归。我特地在小说里安排了她仍存在着能去中国参观的希望。

书中其他不很重要的人物，如石坚姐的父母，那位照顾了他的女教授，以及后来从加拿大回到祖国的台湾同胞郑学好，对于祖国都有不可解说的向心力。这也可以反映出，住在台湾的大陆人，是多么向往回到故乡。可是在分裂的局面下，他们只有等待，盼望。

这本小说的笔法，还不够成熟。但我只愿以高度的热情，抛砖引玉，引起文学界朋友的注意；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的文学界，对于中国统一的问题，多加注意，并透过文学，尽一个作家的责任。

今年适逢祖国建国卅周年，我以虔诚的心情，愿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，作为献给祖国的礼物。我并祈祷，愿祖国进步，早日统一。

五月的台北，气候相当闷热。虽然有时候会吹来徐徐微风，也驱除不了那闷热带给人的烦躁。特别是热风吹来，有一种粘粘的感觉。加上市区里嘈杂的音乐，使人更觉得热而闷。六十年代的台北市，脏，乱，拥挤。因此，闷、热、乱、挤凑在一起，常有令人作呕的滋味。

在市中心一条狭窄的街道转角口，有一家专卖西书的书局。二十来岁的石坚如，正在把刚进口的一批新书，想办法塞进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的书架上去。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寸地方，都是满满当当的，就跟这个城市一样，到处是拥挤。

他用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下流下来的汗珠，汗背心也湿透了。他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人生就是这样的拥挤，忙碌。从睁开眼睛起，看到的，要做的，都只是一个‘挤’。‘挤’能代表进步，还是代表繁华？去上班，挤公共汽车是个挤，挤得还要看车掌小姐的脸色！”

在台北，搭公共汽车就好象孤儿看晚娘脸色一样。车掌小姐把住车门，你要上车，车里已经是沙丁鱼罐头了，车掌小姐还是半拉半推地将乘客往里塞。搭车的为了赶时间，

也只好委曲求全，让她不当人似地折磨一番。而她的最后目的是要把车门关上。有时，乘客如要她慢一点，她会板起晚娘面孔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我要不关门，你摔下去，摔死了我可不负责啊！”

乘客又有何话好说呢！石坚如每天就要这样，一来一回挤两次。去书局，走过那条街，也是挤。本来是让行人走路的骑楼下，堆满了锅炉碗盏，小吃摊贩一个接一个。这些摊贩的主人，多半是从大陆到台湾的，当兵退伍后，只好在马路边上摆个小面摊糊口。不时，可以看到左右两个面摊的老板，穿了件汗衫，挥着棕叶扇，操着浓厚的山东口音，在那里叹生意的不好做。

这个小角落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有着川流不息的过路人。早晨卖烧饼油条，加上热腾腾的豆浆。有时老板打开煎好的生煎包，那香味使过路人不得不停下来尝它一口。而早晨的豆浆、烧饼等，也是一天里比较好做的小生意。

石坚如有时也会光顾到这小摊上，填一下肚子。因为每天进出，大家早就熟悉。石坚如是上海人，从小跟父母到了台湾。外省人碰到外省人，大家都有客居异乡的感觉。因此石坚如去吃早餐的时候，谈话间无意中都会提到“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去？”

但是对这个问题，谁也找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因此常会惹起那个光头老板操着浓厚的山东口音，气呼呼地说：

“他奶奶的，俺不相信，就会在这地方卖一辈子豆浆。我看不到在老家的老娘，死也不会闭眼。”

豆浆摊旁边，有一个卖布鞋的小摊。那个老婆婆在这街角书店门前摆布鞋摊，有好几年了。她有时听到石坚如他们的谈话，也会凑过来，叹口气说：

“是啊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要有一天能够回去看看。都是我那个老不死的，十多年前带我来台湾。台湾话听不懂，找生活又不容易。丢了儿子在老家，现在算算也该有三十多了。一个字也收不到。”说着说着，她会用衣襟擦擦眼角。

在那个不受人注意的街角，石坚如虽然为那热、闷、挤、乱搅得有时发躁，但他也尽情享受同那些豆浆摊、布鞋摊、小面摊的主人们闲谈的愉快。每次谈话时，他也为自己的父母感到不平。一家数口，挤在一间大杂院的二楼对街屋中。父母的睡房和自己的“小天地”，也只是一道板子隔起来的。父亲到台湾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只有让儿女在读书闲余时，去找份零工，几个人东拼西凑，勉强将这个家维持下来。可是父亲只不过五十来岁，看来已经苍老不堪，在家时常唉声叹气：

“什么时候才能回老家去？这样下去，一条老命可能要断送在台湾了。”

母亲看到父亲的消沉，也只有常在暗中饮泣。石坚如觉得自己是老大，因此也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担子，来减轻父母精神上的负担。他白天工作，晚间读书。

在拥挤的书店里，地上，桌子、椅子上，书架上，到处是书和杂志。连后边的小洗手间墙上，也钉了几个架子，放满

了纸盒等杂物。这间书店的老板，就是个不懂装饰的人。石坚如从别处听到，老板也是上海来的。抗战胜利后，很多人发了接收财。有一批人到了台湾，在市中心，在无人居住的房子上，用图钉钉上自己的名片，那幢房子就属于他的了。石坚如的老板，也是那时候来台湾，在这街角口的大楼上钉了自己的名片，才开了这家书店。

多少次，石坚如想建议老板，把铺子整理、装饰一下，好让买书的人走进书店的时候，有点舒服的感觉，也比较容易找到要买的书。因为不止一次，顾客进到书店里问要买的书，虽然石坚如对店里的情况很熟悉，大部分书名也记得，却常会因为书堆在一起，而有找不到的时候。去问老板，他也是在那张堆满账单、书目的书桌上乱翻一阵，最后只好摇摇头说：

“对不起，这本书卖完了。”

而在几天之后，在清理别的书的时候，又会发现先前顾客要买的书，有好多本埋在别的书下面。石坚如对这情形看惯之后，也只好摇摇头，叹口气。老板的个性就是如此，因为他的生意同各大学有直接来往，对于门市部的生意也就无所谓了。

一天天的忙碌。忙碌过后，石坚如在店里吃了老板供应的晚餐，收拾一下，总是对老板说：

“老板，我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
老板正架了副眼镜埋在书桌上算账，听到石坚如的声音，已经习惯，因此头也没抬，随口应了声：“明天见。”

石坚如很感激这位老板，虽然他有很多地方太市侩气，至少石坚如晚上去读书的要求，他没有拒绝。除了薪水照付之外，老板还常对石坚如说，如果他喜欢看什么书，可以在书店拿。

石坚如也因此常对自己说：

“世界上是有好人的，虽然他们也有缺点，至少应该往好处看。”

—

走出店门，早晨的烧饼、油条、豆浆和生煎包味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打卤面、牛肉面的味道。此外，空气里还夹杂着极为混浊的汗臭味，加上阴沟里的黑水经过一天太阳的蒸发，石坚如只觉得浊鼻。但是每天闻惯了，他也不去计较，而且时日久了，也引不起什么特别的反应。

夜晚的台北，更显得嘈杂。五光十色的招牌，看来似乎很热闹；热闹中还夹杂着刺耳的小调，听来肉麻，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庸俗。

台北开车的都有按喇叭的习惯。公共汽车司机按喇叭，开出租车的猛按喇叭，一遇到开私家车的司机，那更是耀武扬威，那只手在方向盘上一按，即表示：“我来了，你要让开。”大都市本来就是权势的集中地，有钱就有地位，有势力就要比人高一等，那“私家车”正代表了“钱”与“势”。一般小市民当然要“回避”了。

音乐的播放，已经失掉了那种幽雅的欣赏价值。左边要是在播放西洋流行歌曲，右边的日本歌曲就会放得更响一点，那对面的台湾小调，就要来个“声震五洲”了。在街上消闲的，或是购物的，在震耳欲聋的情况下，除了皱皱眉，嘴里咒骂几声外，也无可奈何。

石坚如每天晚上夹着书，匆匆地走出这地狱似的市中心后，在通往大学的那条绿荫大道上，他会不自禁地深深地吁口气，好象这一来，一天积压的郁闷，都吐得干干净净。有时还会轻松地吹着口哨，徒步到学校去。他喜欢走路，一天书店里的工作之后，这时候是松松筋骨的最好机会，也好让他的头脑清醒一下。他常常边走边问自己：

“我上大学是什么？在这个小小的岛上，就算是毕业了，我又能做什么？这个社会，只看文凭，只看权势。我这个无名小卒，又能发挥什么作用？”

多少次，石坚如的母亲殷殷叮嘱：

“孩子，好好读书。有一天能回老家，也好对国家有些贡献。”

“老家”这两个字多熟悉，又多陌生。在石坚如的脑子里，“老家”的印象是淡淡的，但这份淡淡的印象，却有着浓浓的的感情。正如他父亲常说的：

“叶落归根，我这个快枯的叶，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到自己的根上去？”

父亲的叹息，母亲慈祥的叮嘱，使石坚如的心里自幼慢慢地萌发着一棵芽来，这是一棵思乡的芽，在好奇、幻想及对现实认识的交织下，渐渐成熟。但是，这棵渐渐成熟的芽，却受到了“高气压”的压迫。他不能在别人面前表达。因为表示“思乡”“谈祖国”，是有罪的。

路上静静的，只有偶然经过的汽车，会打断他的思绪。在这条绿荫大道上，他已经不知走了多少个晚上。这是最

后一年，大学快毕业了。毕业后又怎么办？继续埋在书店里混两碗饭吃？

多少个晚上，母亲坐在那狭窄的屋子里，慈祥地对石坚如说：

“孩子，这些年来，你也苦够了。父母没有尽责，不能供你读书。妈知道你是个求上进的孩子。大学毕业了，找份好好的工作，讨个媳妇，妈也好跟你过几年好日子。”

“妈，我知道要求上进，但是我不想升官发财。我没有这种福分，我也不感兴趣。”

“妈的意思不是要你去钻营，而是说，要求生活上的安定。”

“妈，你看这种社会，我能够适应吗？我只想早些离开。不是我不爱这个家，而是这个地方会让我窒息。”石坚如每触及这一问题时，情绪就会激动起来。

“妈知道你有一天会离开的。鸟长大了，翅膀丰满了，这个小巢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”母亲的声音带有忧郁，“可是，坚如，你要离开，这个家就没有中心了。”

“这个家就没有中心了。”这句话不断让石坚如反复思考。此刻他走在路上，这句话又出现在脑中。

“矛盾，矛盾，人生就是一个极大的、荒唐的矛盾。”他边走边踢着路上的石子，这样地在自言自语。

家，个人自由，爱，对父母的爱，对国家的爱，在他的思潮中冲击，顾到一就顾不到二，怎么办？

把这个问题暂时放在一边，等毕业了再说吧。

走到学校，他按照惯例向同学点头打个招呼，然后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拿出书来，先很快地看一遍。时间对石坚如是一分一秒都相当宝贵的，他最怕的是在看书的时候，有同学走过来打岔。而你越不希望发生的事，却偏偏发生了。

这时，有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走过来。其中一个个子较高的，是学校西洋乐团中吹喇叭的，平时喜欢跳交际舞。对他来说，上不上课不要紧，但是有舞会错过了，是最伤心的。他明知石坚如不喜欢跳舞这一套，却故意捉弄他：

“嗨，石坚如，周末有个舞会，要不要带个女伴来参加？”

石坚如还没回答，另外一个胖胖的抢着对那高个子说：

“石坚如怎么会去和你这种人混！你也不看看自己的长相。”然后转向石坚如问道，“你说对不对？跳舞没什么意思。我看星期六晚上，你来参加我们的牌局好不好？我们正好三缺一。”

石坚如明知跟这伙人是搅不来的，但对他们也无可奈何，只得随便应一声：

“我不会跳舞，星期六我还要上班，打牌我连看都看不懂，你们自己去吧。”

他们其中的一个小个子，生得鼠头鼠脑，两只眼睛骨碌碌的，一看他那对眼睛转来转去，石坚如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这小个子推了那个胖子一下，半讥讽地说：

“你们请人也不看看，石坚如这样的学者，你们配请吗！看人家这么用功，你们都不知害臊，走，走，走。”

那个高个子仍不死心，被那小个子边推还边叫着：

“找个女朋友去跳跳舞，不要整天埋在书堆里，不是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嘛。”

石坚如对这种骚扰，已经不止一次地感到头疼。可是，各人有各人的自由，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目的，怎么办？

上课铃响了，今晚上的是西洋文学，执教的是一位女教授。她的身材矮小，已过中年，显出中年女性的胖体型，鼻梁上架了副深度近视眼镜。她喜欢化妆，一进教室，就可以嗅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。因为她人矮小，为此她常喜欢穿高跟鞋来上课，手上提了个皮包。走进教室的时候，高跟鞋跟敲在水泥地上，“笃笃”地告诉学生是她来了。她也喜欢戴耳环，而且只要稍加注意，即可发现每次上课，她总要换不同的服装。

书本、耳环、皮包、高跟鞋和香水，使这位女教授有了奇异的“混合”。石坚如不喜欢这种“混合”。但是课开了，而且是必修，不来也得来。加上她讲书的内容，又提不起石坚如的真正兴趣。这些都使得石坚如脑中有一个新的问题在盘旋：

“进大学要参加考试，然后再分配。即使不是自己的兴趣，也要硬着头皮干下去。读完了之后又做什么？这种大学教育，是不是对自己、对别的青年人有用？”

他自己已经走过了这四年，而又有多少更年轻的孩子，也在拼命地朝大学里挤，为的是什么？

今晚这位女教授来上课，内容是讲英国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。她走上讲台后，放下了皮包，眯着眼朝台下扫了一下，

然后笑着说：

“今晚我们来讨论《双城记》，不知道哪位同学可以自告奋勇，先为大家讲一下大纲。你们有没有看完这本小说？”

课堂里是寂静的，女教授知道她得到的反应代表着什么。停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：

“如果没有人愿意自告奋勇，那我就指名了。”说完她又向台下扫了一眼，然后对石坚如说：

“你，石坚如，我想请你说一说，书开场的时候，那主人公穿的是什么衣服？什么颜色？”

本来石坚如对这位女教授就没有什么好感，加上现在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文学价值，不值得讨论，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勇气，石坚如坐在那里，理直气壮，但是并不表露出他的不满，淡淡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对这种不寻常的答案，在学校里谁都会觉得突然。那位女教授用手指推了下眼镜，先是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地她又笑着说：

“你既然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，那你来大学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来混学位的。”石坚如调皮地回答。

“混学位又有何用？”那女教授继续问道。

“混学位为的是找饭碗。”

“没有学位，不是一样可以找饭碗吗？”她仍然强自镇定地问。

这时候，教室里鸦雀无声，空气里带着些紧张的气息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平时沉默寡言的石坚如，会对教授顶嘴。而一些平时调皮捣乱的同学，这时候却低着头，坐在那里，动都不敢动。

石坚如这时又回答女教授的问题：

“老师，有学位和没学位不一样，赚的收入就不同。有这张文凭，可以活得舒服些。这个社会是只看纸，而不看人的本身质地好坏的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社会是现实的，你既然来了学校，要混学位，也要参加考试，及格了才拿得到学位呀！你这种态度，能应付考试吗？”

看来，那位女教授的理由可以说服石坚如。教室里的同学都在等待，看石坚如如何回答。只见他一只腿搁在另一只的膝上，冷静地说：

“老师，我对这门课根本没兴趣。”

“我很喜欢你的坦白。”那女教授仍然笑咪咪的，但她的脸颊上起了红晕，她意识到石坚如说的是在暗指着什么，“不过，石坚如，你对这门课没兴趣，那么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呢？”

“我没兴趣去研究别人的作品，我有兴趣研究自己未来的作品。”他感觉到说这话，别人会认为他太自负。但他也不知道这话是怎么脱口而出的。

同学们这时也感到，如果再僵下去，对于老师是不好下台的。因此，一个坐在石坚如背后的女同学，在他的背上触了一下，意思要他不必再说下去了。但石坚如又开口了：